

## 幻想破灭：国际刑事法院缘何沦为法律空壳\*

梅德韦杰夫·德米特里

梅德韦杰夫.幻想破灭：国际刑事法院缘何沦为法律空壳//法学，2025年，第69卷，第1期，第43–57页。  
<https://doi.org/10.21638/spbu25.2025.103>

### 摘要

追求正义并希望将世界上有罪的强者绳之以法，追究其对公共利益和人类犯下的罪行——这些理念在各个时代都团结了人们。然而，并非所有这些理念的体现都值得存在。国际刑事法院（ICC）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其成立文件《罗马规约》中的法律缺陷，包括内部矛盾及其某些条款与《联合国宪章》的矛盾，国际刑事法院的政治倾向性，其“司法”的选择性，以及对非《罗马规约》缔约国的现任主权国家元首非法签发逮捕令的做法（而这些逮捕令往往为众多国家所无视），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实际上已从一个国际司法机构转变为法律战工具的事实，都明确表明其完全不具备合法性。因此，它应当退出历史舞台，而其法官、检察官和其他作出非法决定的官员可能并且应当根据俄罗斯刑法被追究罪行。作者认为，国内法律专家应在一切可能的平台上，有理有据地详细提出对国际刑事法院判决的专业批评，向国际法律界、媒体和各国公民阐述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冲突及其他紧迫问题上的国际法律立场。此外，鉴于国际刑事法院活动中的缺陷，相关国家可以寻找机会创建一个没有这些缺陷的新国际刑事法院。该法院的成立条约应基于一切公认的现代国际法规范，其管辖权可涵盖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恐怖主义行径。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司法、联合国宪章、国家元首豁免权、侵略、联合国安理会、法律战。

*Quod licet lovi, non licet bovi*

世界总在变化，且远非永远朝着良性方向演进。我们亲眼目睹诸多超国家法律机构的急速退化，这些机构已然沦为所谓“集体西方”的意志、资本及价值体系的附庸。国际刑事法院（总部位于海牙）即为典型案例之一。二十五年前其创立者的善意初衷，如今显然已沦为通往地狱之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道路正变得愈发真实可触。

此种境况虽令人扼腕，但遗憾的是，却完全有迹可循。只需回溯该法律机构的沿革便可发现：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虚假必要性到彻底失效的蜕变，如今已然站在荒谬、偏颇与犬儒主义的边缘。因此，必须了解该机构现行举措的动因机制，明确应如何应对，以及最终应由何种新型机制取代这一迅速丧失公信力的国际机构。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法学博士，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地址：俄罗斯联邦，125009，莫斯科，沃兹德维任卡街16号1号楼。

\*俄文翻译李春雨。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25

## 1.

一切的缘起近乎庄严神圣。“追求正义”这一永恒目标无论在任何时代均凝聚着全球亿万民众。历史记载着无数这样的时刻：当权者沉醉于免受刑罚的狂喜，而庞大帝国在民众的怒潮中顷刻间土崩瓦解。然而，凭借本国司法体系追究权贵阶层危害公益及反人类的罪责，向来举步维艰。正因如此，这一使命必须由不依附于任何国家权力的超国家司法机构来完成。

二战后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尝试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法律至上原则、实现真正平等与正义的创举——这种努力超越了国家疆界、跨越经济与意识形态藩篱。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在历史上履行的特殊职能，是德国、日本及其前盟国司法机构所无法胜任的。

随着这些国际审判的结束，各国法学家纷纷提议设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司法机构，使其有权对犯下最严重反人类罪行的个体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些倡议因旷日持久的冷战而被迫搁浅。直至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关于设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才得以重启<sup>1</sup>，并最终于1998年在罗马签署了创始性文件——《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国际刑事法院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而设立的。其主要管理机构是缔约国大会，由所有成员国组成（目前为125个）。大会设有主席团，其职责是“协助大会履行其职责”（《罗马规约》第112条第3款）。法院的主要职能，即对犯有“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最严重罪行”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由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履行。法院由18名法官组成（这些法官由缔约国大会选举产生）、检察官办公室（由该大会选出）和秘书处。法官在以下机构中履职：预审分庭——负责批准启动刑事调查并签发对嫌疑人的逮捕令；审判分庭——负责案件的实体审理；上诉分庭——审理对下级分庭行为和裁决的上诉；以及院长会议——除其他职责外，负责“法院事务的妥善管理，检察官办公室除外”（《罗马规约》第38条第3款）。院长会议由法院院长领导。

根据《罗马规约》第119条，涉及国际刑事法院司法职能的一切争议均由该法院自行裁决。由此，国际刑事法院在涉及自身的争议案件中成为唯一且最高审级——即在其自身案件中充当裁判者（严格而言，这本身已违反了“*nemo iudex in propria causa*”<sup>2</sup>这一原则）。国际刑事法院的全体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在缔约国境内（包括东道国荷兰领土）享有国际豁免权等特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涵盖最严重的犯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但该院并不具有普遍管辖权，其司法权仅适用于在成员国领土内实施的犯罪或成员国国民实施的犯罪行为。<sup>3</sup>除上述争议条款外，《罗马规约》起初就包含某些其他规定，这些规定在很多情况下将导致其裁决无法执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下文将详述）。

---

<sup>1</sup> See: Schabas W.A. Chapter 1: The dynamics of the Rome Conference in *The Elgar Compan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d. by M. deGuzman and V. Oostervel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20. P. 4-5. See also: *Summaries of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code of crimes against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mankind (Part II) — including the draft Statute for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https://legal.un.org/ilc/summaries/7\\_4.shtml](https://legal.un.org/ilc/summaries/7_4.shtml) (accessed 03.02.2025); *Internation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engaged in illicit trafficking in narcotic drugs across national frontiers and other transnational criminal activities: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ith jurisdiction over such crimes: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4 December 1989 (A/RES/44/39)*. <http://www.worldlii.org/int/other/UNGA/1989/52.pdf> (accessed: 03.02.2025).

<sup>2</sup> 拉丁语：“任何人不得自审其案。”

<sup>3</sup> 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研究著作浩如烟海。最新成果参见：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d. by A. Heinze, V. E. Dittrich. Brussels: Torkel Opsahl Academic EPublisher, 2021. XXI, 783 p.; *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Statute*. Vol. 1. Eds.:

尽管如此，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仍获得必要数量国家的批准，并于同年7月1日正式生效。彼时的国际格局与当今截然不同。不言而喻，在商定《罗马规约》文本时（一如任何国际条约的制定过程），逾百国代表都在寻求互相可以接受的妥协性条款，以便加强该领域的国际合作。那些始终坚持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国家确信，依托联合国文件所载国际法核心原则，相关矛盾终将逐步化解。正是基于此考量，俄罗斯外交部于2000年批准以俄罗斯联邦名义签署《罗马规约》。

然而，国际刑事法院的后续运作迅速暴露出其政治倾向性。甚至该法院自身亦严重违反国际法公认原则。在此政治法律背景下，俄罗斯于2016年决定退出《罗马规约》<sup>4</sup>。美国等国家亦在不同时期宣布退出。鉴于中国从未签署《罗马规约》，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已有三国未参与该条约体系。

## 2.

国际社会曾对国际刑事法院寄予厚望。然而在其创设之际便不难发现，该法院在法律构建层面显得颇为奇特。其宪章性文件中原本就埋藏着诸多根本性悖谬，其中最主要者当属与适用的国际法核心准则——尤其是作为战后国际法秩序基石的《联合国宪章》——形成直接冲突。须知正是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下，才发展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间条约体系，以及各类区域性及双边协定。

《联合国宪章》第103条明确规定，其条款对任何其他国际协定的条款具有优先效力。根据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释义，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包括综合性条约及专门性条约）、国际习惯及一般法律原则。

但在《罗马规约》中却规定了其国际法渊源的自有层级。根据《罗马规约》第21条，海牙法院首先适用“本规约、《犯罪要件》及本院《程序与证据规则》”。其次（且并非在所有情况下）才适用“通用国际条约、国际法原则和规范，包括普遍认可的武装冲突国际法原则”。

这也就意味着，根据1998年《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只能在第二顺位适用《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原则，即首先适用《罗马规约》以及由《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和国际刑事法院自身通过的文件。如此一来，该准司法机制便获得了某种“豁免权”，使其能够忽视《联合国宪章》及其所载的法律规范。《罗马规约》中对适用国际法的这种曲解性调整，对于任何主权国家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包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

此外，《罗马规约》中使用的“刑法一般原则”这一术语本质上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并未区分国内刑法（例如美国的刑法）和适用于打击跨国犯罪的国际刑法。

所有这些“概念上的混乱”显然不符合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利益（事实上也不符合任何其他主权国家的利益）。尽管法学界有时将《罗马规约》与其他文件相提并论，但必须明确区分《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的创始性文件——与苏联及其盟国（其他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成的一系列国际协议——从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四国宣言》开始。更何况，《联合国宪章》第106条明确援引了这一大国宣言。同样，1945年8

---

M. Klamberg, J. Nilsson, A. Angotti (editors). 2nd ed. Brussels: Torkel Opsahl Academic Epublisher, 2023. 1104 p.

<sup>4</sup> 参见：《俄罗斯联邦总统2016年11月16日第361-пн号令：关于俄罗斯联邦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意向》。<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387>（访问日期：2025年2月4日）。另见俄罗斯联邦政府2016年11月30日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照会文本：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Rome, 17 July 1998: [status as at: 14.02.2025 10:15:47 EDT] /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VIII-10&chapter=18&clang=\\_en#9](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VIII-10&chapter=18&clang=_en#9) (accessed: 14.02.2025).

月8日伦敦会议上签署的《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由苏、美、英、法四国政府达成）也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创始性文件有根本区别。根据《联合国宪章》，上述文件的国际法律意义优先于国际刑事法院发布的任何文件。

然而，那些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展产生影响的人士却对此毫不在意。正是在忽视这一根本性政治法律差异（将二者混为一谈，统称为“国际刑事司法”）的前提下，开展了一系列诉讼程序。例如，北约支持的对塞尔维亚领导人的追诉就是在所谓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框架下进行的，该法庭旨在控诉自1991年以来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的责任人。在俄罗斯的国际法研究中，这种混淆是不被允许的，也从未被接受过<sup>5</sup>。类似的矛盾例子不胜枚举。

### 3.

结果，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实践开始引发合理质疑，而且不仅仅是法学界的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刑事法院越来越暴露出对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依赖，而这些因素本应被排除在其司法实践之外。该国际机构明显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完全基于所谓“集体西方”的利益及其偏爱的双重标准来决定定罪或者赦免。有趣的是，国际刑事法院还对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表现出讨好态度，而这些国家却对该法院及其实践持轻蔑态度。这点不难理解，毕竟在西方世界存在严格的等级关系，这在最近的“内塔尼亚胡及加兰特等人案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罗马规约》缔约国的欧洲国家起初表示愿意参与对以色列领导层的追诉，然而在华盛顿的严厉斥责后，却陆续声明此案的“特殊性”，并拒绝追究以色列领导层的刑事责任。严格说来，国际刑事法院此后本应决定自行解散，因为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大的来自缔约国的轻侮了。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官网公布的数据，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该法院共计审理33起案件，其中部分案件仍在审理中。这些案件包括对来自非洲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苏丹、卢旺达、肯尼亚、利比亚、科特迪瓦、马里、中非共和国）的某些政治军事领导人的调查。据称，这些人涉嫌实施酷刑、暴力、抢劫、大规模屠杀、绑架、摧毁整个和平居民点、虐待战俘和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

一些案件的被告确实被定罪并被监禁。通常情况下，这些人是少数国家中的直接执行者，即那些被收集到证人证言指控的官员。然而，一些高级别战争罪犯却依旧逍遥法外。对于这些人，国际刑事法院表现出了选择性的失明与失聪。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国际刑事法院不惜耗费多年时间，极其细致地审理了某些确实残忍但却相对普通的种族帮派头目、连环杀手及强奸犯案件。即使这些罪犯手上沾满了同胞的鲜血，他们也绝非对全人类构成威胁的强大政治人物。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些“战地指挥官”、非洲部落冲突中的首领以及其他罪犯，是否真的是“国际罪犯”，以至于无法通过其本国的司法力量来应对？<sup>6</sup>为了惩治和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是否有必要创建国际刑事法院这样庞大且昂贵的机构？

难怪非洲联盟委员会前主席让·平曾对记者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只是新殖民主义的玩物。<sup>7</sup>有观点认为，国际刑事法院似乎只对追诉那些抵制西方影响的非洲人士感兴趣，并

<sup>5</sup> 参见《国际法与打击犯罪：文件汇编》，A. B. 兹梅耶夫斯基和Ю. М. 科洛索夫作序，莫斯科，1997年。

<sup>6</sup> 威廉·沙巴斯在评价国际刑事法院时写道：“只有少数案件得到了审理。许多被告都是不知名冲突中的小人物。平均刑期在12到13年之间，很难相信国际刑事法院是在处理那些对‘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Schabas W. A. Op. cit. P. 19）

<sup>7</sup> Bosco D. Why is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icking only on Africa? (March 29, 2013) /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why-is-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icking-only-on-africa/2013/03/29/cb9bf5da-96f7-11e2-97cd-3d8c1afe4f0f\\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why-is-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icking-only-on-africa/2013/03/29/cb9bf5da-96f7-11e2-97cd-3d8c1afe4f0f_story.html) (accessed: 04.02.2025).

将非洲当成了国际刑事司法的“试验场”<sup>8</sup>。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7年，非洲联盟便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所有非洲国家停止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不再执行其针对非洲嫌疑人的逮捕令，并集体退出该机构<sup>9</sup>。国际刑事法院偏袒行事，并为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拒绝追诉北约国家人员，这点已被各大洲代表所认识。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布隆迪和菲律宾等国亦宣布退出《罗马规约》<sup>10</sup>。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际刑事法院不知为何始终未将目光投向那些对于公正、和平和人道主义只能梦寐以求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正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推进自身利益的地方。例如，北约国家的军人在阿富汗境内开展了近二十年的密集军事行动（从2001年到2021年），而阿富汗早在2003年便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据媒体报道，在此期间，北约军人实施了足以被定性为战争罪行的行为<sup>11</sup>。但国际刑事法院却从未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另一个例子是，2017年11月，时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法图·本苏达向预审分庭提出申请，请求批准对阿富汗反对派运动“塔利班”成员所犯的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阿富汗政府安全部队所犯的战争罪，以及自2003年5月1日以来美国军人和中央情报局人员在阿富汗境内所犯的战争罪展开调查。预审分庭对此请求审议了一年半，最终于2019年4月拒绝了该检察官的申请，裁定“在当前阶段对阿富汗局势进行调查不符合司法利益”<sup>12</sup>。针对这一决定，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向上诉分庭提出申诉，上诉分庭于2020年3月撤销了预审分庭的裁决<sup>13</sup>，从而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启动初步调查（包括对美军和美国公民在阿富汗境内所犯战争罪的调查）提供了可能。

此后，并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美国政府对其军人和公民可能被国际司法机构追究责任一事作出了强烈反应。2020年6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军、美国情报人员及其他人员在阿富汗境内可能做出的或者与其相关的行为开展调查的管辖权主张，“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的异常而极端的威胁”<sup>14</sup>。特朗普援引美国法律，签署了第13928号行政命令，规定美国国务卿在与财政部长和总检察长协商后，有权锁定任何直接参与国际刑事法院擅自对美国人员进行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的“外国人”，或为国际刑事法院相关行动提供物质支持、赞助、资金、物资、技术、商品或服务的外国人。这些人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财产可能被冻结，并可能被禁止入境美国<sup>15</sup>。

---

<sup>8</sup> See: Bachmann S.-D. D., Sowatey-Adjei N. A. The African Union-ICC Controversy Before the ICJ: A Way Forward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9. 2020. № 2. P. 249.

<sup>9</sup> Ibid. P. 249–250.

<sup>10</sup> The Philippines' membership in the ICC comes to an end, 15 March 2019 / Coali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https://coalitionfortheicc.org/news/20190315/philippines-leaves-icc#:~:text=As%20of%2017%20March%2C%20the,after%20Burundi%20withdrew%20in%202017> (accessed: 04.02.2025).

<sup>11</sup> 关于阿富汗战争罪行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ing Y. How US evades responsibility for war crimes in Afghanistan / Global Times.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9/1235240.shtml> (accessed: 14.02.2025).

<sup>12</sup> Pre-Trial Chamber II: Situation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No ICC-02/17, 12 April 2019. <https://www.icc-cpi.int/court-record/icc-02/17-33> (accessed: 04.02.2025).

<sup>13</sup> The Appeals Chamber: Situation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No. ICC-02/17 OA4, 5 March 2020, para. 79. [https://www.icc-cpi.int/CourtRecords/CR2020\\_00828.PDF](https://www.icc-cpi.int/CourtRecords/CR2020_00828.PDF) (accessed: 04.02.2025).

<sup>14</sup>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U.S. Sanctions in Response to Investigation of War Crimes in Afghanistan, June 19, 2020.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1428> (accessed: 04.02.2025).

<sup>15</sup>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U.S. Sanctions in Response to Investigation of War Crimes in Afghanistan, June 19, 2020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RL: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1428> (访问日期: 04.02.2025).

2020年9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和检察官办公室官员法基索·莫乔科实施个人制裁<sup>16</sup>、<sup>17</sup>

最终，尽管国际刑事法院获得了对阿富汗境内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展开调查的权利，但新任检察官至今仍未对参与阿富汗战斗的美军人员提出任何指控。

五年后，唐纳德·特朗普再次掌权，他首先延续了此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并且不仅限于言辞上的愤怒。2025年2月6日，美国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以回应“针对美国及其亲密盟友以色列的非法和无理行为”<sup>18</sup>。特朗普总统将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为称为“威胁侵犯美国主权”<sup>19</sup>，并警告国际刑事法院的官员、工作人员、代理人及其直系亲属将面临“切实而严重的后果”，包括财产和资产被冻结以及禁止入境美国<sup>20</sup>。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实施个人制裁的第一个对象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正是他推动了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发出逮捕令。根据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卡里姆·汗被暂时禁止进入美国，其在美国境内的财产（如果目前有或者未来可能有）也将被冻结<sup>21</sup>。

<sup>16</sup> 在政治学与法学研究中，关于“制裁”（санкции）这一术语的含义尚未达成共识（参见：И. С. 普季布拉托夫《制裁与单边限制性措施：术语区分与现象同一性问题》//《人文科学：金融大学学报》，2020年第10卷第6期，第64页）。尽管如此，针对国家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授权情况下单方面采取的强制性措施使用“制裁”术语的做法已多次受到学界批评（例如：М. В. 雷若娃《现代国际法中的经济制裁》博士论文摘要，喀山，2006年，第8页；К. В. 克里茨基《“国际制裁”与“单边限制性措施”术语辨析》，《莫斯科国际法杂志》2016年第2期，第208页；К. В. 克里茨基《现代国际法中的制裁与单边限制性措施》博士论文，莫斯科，2019年，第10页；Д. Г. 阿列克谢耶娃、Я. О. 阿利莫娃、И. С. 巴尔济洛娃等：《制裁条件下的法律》，М. В. 马若里娜、Б. А. 沙赫纳扎罗夫主编，莫斯科：进步出版社，2023年，第93–94页）。这种批评具有合理性：由于“制裁”术语通常与针对违法行为主体采取的强制措施相关联（即合法措施），而国家未经安理会决议单方面实施的限制性措施往往缺乏合法性。因此从法律角度将后者称为“制裁”至少是不准确的。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文件通常仅将安理会采取的强制措施称为“制裁”，由此建立的制度被称为“制裁制度”（参见：A/56/10号文件《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2001年4月23日-6月1日及7月2日-8月10日）》，《国际法委员会年鉴》2001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8页第9段；安理会2014年8月15日第7242次会议通过的第2170(2014)号决议(S/RES/2170)，[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777420/files/S\\_RES\\_2170%282014%29-RU.pdf?ln=ru](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777420/files/S_RES_2170%282014%29-RU.pdf?ln=ru)（访问日期：2025.03.06）；《联合国安理会附属机构/2023年概况介绍》，[https://main.un.org/securitycouncil/sites/default/files/subsidiary\\_organs\\_series\\_7sep23\\_.pdf](https://main.un.org/securitycouncil/sites/default/files/subsidiary_organs_series_7sep23_.pdf)（访问日期：2025.03.06））。相反，某些联合国文件明确避免使用“制裁”指代单边强制措施（例如2016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权与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决议(A/RES/71/193)，[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857550/files/A\\_RES\\_71\\_193-RU.pdf?ln=ru](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857550/files/A_RES_71_193-RU.pdf?ln=ru)（访问日期：2025.03.06））。尽管如此，在政治学与公共话语中，“制裁”术语仍被用于指称此类措施（参见：K. 格沃尔基扬《“单边制裁”与国际法》，《国际事务》2012年第8期，<https://interaffairs.ru/jauthor/material/720>（访问日期：2025.03.06））。本文为行文简练，亦采用“制裁”术语指代国家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

<sup>17</sup> Blocking Property of Certain Persons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Designations /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https://ofac.treasury.gov/recent-actions/20200902> (accessed: 05.02.2025); US imposes sanctions on top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fficials /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law/2020/sep/02/us-sanctions-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fatou-bensouda> (访问日期: 05.02.2025). 此后，第13928号行政命令被撤销（see: Executive Order 14022 of April 1, 2021 «Termination of Emergency With Respect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https://ofac.treasury.gov/media/57411/download?inline> (accessed: 05.02.2025)).

<sup>18</sup> Imposing San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xecutive order, February 6, 2025 /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imposing-sanctions-on-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 (accessed: 14.02.2025).

<sup>19</sup> Ibid.

<sup>20</sup> Ibid.

<sup>21</sup> Ibid.

#### 4.

然而，国际刑事法院在针对主权国家元首发布逮捕令方面，达到了荒谬和无用的极致。其中包括因乌克兰局势对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的逮捕令<sup>22</sup>。法院官员在作出这些决定时非常清楚，这些决定在实践中不会得到执行。唯一可能达到的只有宣传效果——当然，这仍然是为了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利益。

当然，不能将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和官员视为疯子或无知者。他们是经验丰富的律师，非常了解国际协议的内容，并清楚自己权力的界限。但他们从未拒绝执行“意识形态任务”，尤其是在涉及主权国家元首的案件中。

在创建国际刑事法院时<sup>23</sup>，《罗马规约》的缔约国达成了妥协。一方面，规约文本规定，国际法规定的国家元首或其他高级官员的豁免权“不应妨碍”国际刑事法院“对该人行使管辖权”（第27条）。另一方面，同一文件也规定：法院有义务就放弃本国高级官员豁免权问题与相关国家“预先取得合作”。（第98条）。

实际上，国际刑事法院在未经相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已经对某些现任主权国家元首（通常是非西方国家）发出了逮捕令。第一批此类逮捕令是针对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2009年）和利比亚临时领导人穆阿迈尔·穆罕默德·阿布·明亚尔·卡扎菲（2011年）发出的。卡扎菲案因其死亡而终止，而对其儿子和助手、时任利比亚实际总理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的逮捕令至今仍未执行（案件尚处于预审阶段）。

至于奥马尔·巴希尔，苏丹拒绝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逮捕令，并强调这是“政治性”文件，与国内法相抵触。而国际刑事法院本身也没有执行此类行动的管辖权。逮捕令在巴希尔访问的一些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如马拉维、约旦、乌干达、乍得、南非等）也未得到执行。其中一些国家的法律立场被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分庭审议。这些审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刑事法院关于非成员国高级官员豁免权的立场。国际刑事法院对此问题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上诉分庭关于约旦未将奥马尔·巴希尔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中。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观点，“……习惯国际法中的任何豁免权在此种情况下都不应阻碍国际法院行使其管辖权”<sup>24</sup>。因此，国际刑事法院实质上认为，习惯国际法中并不存在任何规则，可以为非《罗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元首提供豁免权，使其免受《罗马规约》缔约国根据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逮捕和移交请求而采取的逮捕和移交行动<sup>25</sup>。

这些主张和另外一些主张极具争议性，引发了国际法领域专家的合理批评，当然也引起了各国司法代表的反对。

---

<sup>22</sup> Situation in Ukraine: ICC judges issue arrest warrants against 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 and Maria Alekseyevna Lvova-Belova. <https://www.icc-cpi.int/news/situation-ukraine-icc-judges-issue-arrest-warrants-against-vladimir-vladimirovich-putin-and> (accessed: 05.02.2025). 另请参阅：《国际刑事法院活动合法性问题：国际刑事法院活动合法性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国际法律委员会意见）》，2024年5月8日 /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legal\\_problems\\_of-international\\_cooperation/1949021/](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legal_problems_of-international_cooperation/1949021/)（访问日期：2025年2月5日）；Opin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dvisory Board under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roblems of Lega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ranslated by grad. students V. V. Pchelintseva and A. M. Korzhenyak] // Mosco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24. № 2. P. 92–104.

<sup>23</sup> 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要主体，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条约创建派生主体，例如政府间组织、国际司法机构等。这些次级主体的权限由其创建国决定。参见：Shaw M. N.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303. 在这方面，雅恩·克拉伯斯关于国际组织的观点是恰当的：“组织是其成员国的创造物……”（Klabbers J.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92）。

<sup>24</sup> The Appeals Chamber: Situation in Darfur, Sudan: in the Case of the Prosecutor v. Omar Hassan Ahmad Al-Bashir: Judgment in the Jordan Referral re Al-Bashir Appeal, No. ICC-02/05-01/09 OA2, 6 May 2019, para. 114. [https://www.icc-cpi.int/sites/default/files/CourtRecords/CR2019\\_02856.PDF](https://www.icc-cpi.int/sites/default/files/CourtRecords/CR2019_02856.PDF) (accessed: 14.02.2025).

<sup>25</sup> See: *ibid.*, para. 117.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对《罗马规约》第27条和第98条作何解释，首先必须将国际刑事法院对主权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的行为定性为违反国际法，尤其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因如下：

首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优先于《罗马规约》的条款，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到。

其次，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是联合国的基础（《联合国宪章》第2条）。国家元首代表相应的主权权力，并且根据国际习惯这一国际法的基本渊源，“在其他国家享有民事及刑事管辖豁免权”<sup>26</sup>。国际刑事法院违反这一规范的行为属于非法行为。

第三，国际刑事法院通过推动逮捕国家元首来侵犯国家主权（尤其是针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从而阻碍其履行职务职能的行为，应被定性为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这主要是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联合国宪章》第24条）。

第四，国际刑事法院无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有三国未加入《罗马规约》。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在不同年份作出了这一决定。因此，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和国际习惯法<sup>27</sup>，《罗马规约》对这些非缔约国不构成任何义务，包括国际刑事法院所宣称的义务。

第五，国际刑事法院的官员必须意识到，试图限制一个主权国家——而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活动，实际上是在阻碍联合国主要机构的正常运作，而该机构对维护全球和平负有特殊责任。在国际社会因根本分歧而分裂、地球实际上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的时代，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本身已经加剧了全球风险。国际刑事法院的具体官员也应对这种对人类威胁的增加承担责任。

## 5.

众所周知，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联邦总统发出备受瞩目的“政治命令”之前，该法院就曾执行过一些来自其幕后操纵者的棘手任务。2014年，在美国协助下，基辅发生了政变<sup>28</sup>，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人民拒绝承认该政变的合法性，基辅当局不断下令炮击顿巴斯地区，事实上对该地区人民实施了种族灭绝。俄罗斯为保护本国同胞采取了措施。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并未对上述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深入的法律分析，而是顺从地支持了美国及其附庸国对我国发起的“法律战争”。这里使用了一个极具争议的术语——“侵略”。顺便提一下，这一术语并非一开始就被列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行为清单中，而是经过多年讨论后才被纳入的。在1998年签署《罗马规约》时，尚未能制定出一个在法律上可接受的对“侵略”的定义。这一问题被提交给缔约国大会解决，该大会于2010年制定了《规约》修正案。修正案中明确了应对此类罪行负责的人员范围，以及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追究其责任的程序。然而，这些新引入的规范显然并不具有普遍性。

在美国的施压下，占多数的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的多份文件中将俄罗斯保护顿巴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称为“侵略”（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决议ES-11/1《对乌克兰的侵略》；2022年3月24日联合国大会决议ES-11/2《对乌克兰侵略的人道主义后果》以及其他文

<sup>26</sup> 该国际习惯法的存在已得到联合国国际法院的确认。See: Arrest Warrant of 11 April 200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Belgium),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2, p. 3, para. 51.

<sup>27</sup> 参见: Document A/6309/Rev.1: Rep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the second part of its seventeenth session and on its eighteenth session //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66. Vol. II.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67. P. 226.

<sup>28</sup> 关于基辅违宪政变的准备情况，以及美国大使馆对政变者的指示，乌克兰前总理尼古拉·阿扎罗夫在其著作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阿扎罗夫曾与乌克兰宪法选举产生的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共事。参见：阿扎罗夫·尼古拉，《乌克兰在十字路口：总理的笔记》，莫斯科：维切出版社，2015年，512页。

件)。其他受西方控制的组织也对此推波助澜，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sup>29</sup>、国际法学会<sup>30</sup>等。最终，在2023年3月，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殷勤地宣布对俄罗斯联邦总统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专员发出逮捕令。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一举措同样经不起任何推敲。西方国家在其论点中严格形式化地使用了1974年联合国大会决议中所定义的“侵略”概念。根据该决议，侵略是指“……一国使用武力侵犯另一国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其他任何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方式使用武力……”，并且“……将导致国际责任”<sup>31</sup>（斜体为本文作者所加）。在将该定义应用于特别军事行动时，西方国家忽视了最重要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尤其是2014年在基辅发生的政变，这一政变由华盛顿方面煽动，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禁止干涉国家内政）。此次政变（*coup d'état*）之后，乌克兰事实上（*de facto*）已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

集体西方还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根据国际法，国家使用武力（包括自卫和预防性自卫）并不构成侵略。但西方国家在国际法立场上的根本缺陷更为严重：他们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即只有联合国安理会（且需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有权确定“侵略”事实并对侵略行为采取行动，而不是其他机构，无论是联合国机构、其他机构或国际组织。

事实上，就连某些《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也同样认为没必要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判决。俄罗斯总统于2024年9月初访问了其中一个国家——蒙古<sup>32</sup>。访问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并圆满结束。这引发了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它立即对蒙古进行抨击，称其未履行《罗马规约》的义务，未遵照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请求逮捕俄罗斯总统。

在国际刑事法院看来，《罗马规约》缔约国有义务逮捕被该法院发出逮捕令的人员，“无论其官方身份或国籍如何”。在这种背景下，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关于其履行职能旨在应对“严重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行为”<sup>33</sup>的声明，听起来讽刺至极。实际上，正是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人员阻碍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主权国家的元首履行其职责，从而加剧了联合国安理会在应对和平威胁时无法作出决策的风险。

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指责蒙古违反《罗马规约》合作义务的文件中指出，规约第98条第1款既未补充也未修改第27条第2款，也未规定其例外情况，即法院认为规约“未规定”主权国家元首豁免权的例外。国际刑事法院认为，任何其他解释都必然会使缔约国的义务“失去意义”，并使整个法院体系“无效，违背了有效性原则（*ut res magis valeat quam pereat*<sup>34</sup>）”，该原则源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根据该条，条约应被解释为以确保其有效实施”<sup>35</sup>。关于“无效性”，的确不得不认同。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多次表现出自己的这一特性。

<sup>29</sup> 联合国专门机构，俄罗斯也参与其中。有关IMF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其网站：About the IMF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imf.org/en/About> (accessed: 05.02.2025).

<sup>30</sup> 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873年。更多信息请参见其网站：About the Institute /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https://www.idi-iiil.org/en/a-propos/> (accessed: 05.02.2025).

<sup>31</sup> 参见其第1条和第5条（《侵略定义》：联合国大会第3314号决议附件，1974年12月14日。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90983/files/A\\_RES\\_3314%28XXIX%29-RU.pdf?ln=ru](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90983/files/A_RES_3314%28XXIX%29-RU.pdf?ln=ru) (accessed: 14.02.2025)).

<sup>32</sup> 对蒙古的正式访问 / 俄罗斯总统官网。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ips/75016> (访问日期: 05.02.2025).

<sup>33</sup> 国际刑事法院：蒙古拒绝逮捕普京一事已提交法院大会审议（2024年10月24日） / 联合国。 <https://news.un.org/ru/story/2024/10/1457701> (访问日期: 05.02.2025).

<sup>34</sup> 拉丁语：“使其有效而非无效”。

<sup>35</sup> Pre-Trial Chamber II: Situation in Ukraine. Finding under article 87(7) of the Rome Statute on the non-compliance by Mongolia with the request by the Court to cooperate in the arrest and surrender of 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 and referral to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No. ICC-01/22, 24 October

至于有效原则，有必要指出：国际刑事法院引用的论点恰是对该原则的曲解。在解释国际条约时，有效性原则要求解释者“必须赋予条约所有条款以意义和效力”，并且“解释者不能采取一种会导致整个条约条款或段落变得多余或无效的解釋方式”<sup>36</sup>。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刑事法院此前曾承认《罗马规约》第27条第2款与第98条第1款之间存在“固有张力”<sup>37</sup>，二者间的矛盾在学术文献中也被详细分析过<sup>38</sup>。所有这些无疑表明《罗马规约》存在法律和技术缺陷<sup>39</sup>，这些缺陷使得原本就不完善的工具变得完全无法使用。

在关于蒙古的结论中，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特别指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与所讨论的问题（即非缔约国是否受规约条款约束的问题——作者按）无关，因为国际刑事法院并未试图将规约中的义务强加于非缔约国，而是寻求缔约国在涉及涉嫌在法院管辖范围内领土上犯下规约第5条所述罪行的个人的案件中进行合作。”然而，这一立场同样站不住脚：那些未向非缔约国高级官员提供豁免权的缔约国，实际上是将《罗马规约》的规定扩展到了该非缔约国，因为后者有权要求其高级官员享有豁免权，而接待国有义务提供这些豁免权。如果接待国根据《罗马规约》第27条第2款未提供豁免权，则要么被视为违反习惯国际法，要么被视为将第27条第2款的规定扩展到了第三国高级官员。非此即彼。

国际刑事法院还以极其傲慢的态度确认，“蒙古可能对俄罗斯联邦承担的任何关于遵守国际法可能赋予国家元首豁免权的双边义务，都不能取代其对法院承担的义务[‘is not capable of displacing the obligation that Mongolia owes to the Court’]，法院被授权行使其管辖权……”<sup>40</sup>。正是如此：在法院内部傲慢的评论者看来，所有国际法文件在《罗马规约》面前都不值一提。

在与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通信中，蒙古援引了关于国家元首豁免权的习惯国际法规则以及联合国国际法院2002年关于“2000年4月11日逮捕令案”的裁决，该裁决确认了这一规则的存在。作为回应，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固执地重申了其立场：“……虽然个人豁免权在国家间关系中有效，但它们并不能保护个人，包括国家元首，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起诉”，并辩称国际刑事法院“……从根本上独立于国家，严格公正，并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服务”<sup>41</sup>。

---

2024, para. 34. <https://www.icc-cpi.int/sites/default/files/CourtRecords/0902ebd1809d1971.pdf> (accessed: 05.02.2025).

<sup>36</sup> Korea – 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 on Imports of Certain Dairy Products: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adopted on 12 January 2000), AB-1999-8 (WT/DS98/AB/R), para. 80.

<sup>37</sup> Pre-Trial Chamber I. Situation in Darfur, Sudan: the Prosecutor v.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No. ICC-02/05-01/09, 13 December 2011, para. 37.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8c9d80/pdf> (accessed: 05.02.2025).

<sup>38</sup> 参见：伊斯波利诺夫 A. C. 《危机的解剖：国际刑事法院规范合法性问题》//《法律》，2024. № 2. 130–131；Kjeldgaard-Pedersen A. Is the Quality of the ICC’s Legal Reasoning an Obstacle to Its Ability to Deter International Crimes? / iCourts: iCourt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91, 2020. P. 15–17. [https://papers.ssrn.com/sol3/Delivery.cfm/SSRN\\_ID3570447\\_code2133408.pdf?abstractid=3570447&mirid=1&type=2](https://papers.ssrn.com/sol3/Delivery.cfm/SSRN_ID3570447_code2133408.pdf?abstractid=3570447&mirid=1&type=2) (accessed: 05.02.2025)；Tladi D. The ICC Decisions on Chad and Malawi: On Cooperation, Immunities, and Article 98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 11. 2013. № 1. P. 199–221；Van Alebeek R. The Immunity of States and Their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Oxfor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78.

<sup>39</sup> 有文献不无根据地指出，“……法院的架构存在一些严重缺陷”（Schabas W.A. Op. cit. P. 19）。

<sup>40</sup> Pre-Trial Chamber II: Situation in Ukraine. Finding under article 87(7) of the Rome Statute on the non-compliance by Mongolia with the request by the Court to cooperate in the arrest and surrender of 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 and referral to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No. ICC-01/22, 24 October 2024, para. 28.

<sup>41</sup> Ibid, paras. 6, 29, 30.

所有这些论点均充满了政治色彩，在法律上则毫无价值。然而，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官员却高调宣布，蒙古“阻碍了法院……行使其职能和权力……”，并且“未履行其根据《罗马规约》承担的国际义务……”<sup>42</sup>，从而驳回了蒙古就此事提出的所有异议。

需要提醒的是，根据《罗马规约》第98条第2款，“法院不得提出移交请求，假如该请求会要求被请求国采取与其国际协定义务不符的行动，而根据这些协定，移交某人至法院需获得派遣国的同意。”2019年《俄罗斯联邦与蒙古友好关系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2020年9月生效）在此意义上适用。根据该国际条约第4条，俄罗斯和蒙古“不得参与或支持任何针对另一方的行动”。

这场围绕司法的喧嚣对蒙古及俄罗斯均未产生任何特别后果。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将对“违规者”采取何种措施——将由其自行决定。在《罗马规约》中，并未规定对未充分配合国际刑事法院行使其职能的成员国实施任何制裁。实践表明，迄今为止也从未采取过类似措施。例如，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在2009年国际刑事法院首次对其发出逮捕令后的七年内，访问了2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但并未在任何一国被捕<sup>43</sup>。这些国家也均未受到任何制裁。尽管对奥马尔·巴希尔的逮捕令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与国际刑事法院不同，安理会有权实施国际法律制裁——的倡议提起的案件发出的。

这再次证明了国际刑事法院及其裁决是多么无用。然而，不能低估西方通过国际司法手段对俄罗斯发起的“法律战争”的规模和潜在后果，以及所有其他不友好行动和非法限制。实际上，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实践，距离从法律上为**绑架**享有豁免权的官员（从非《罗马规约》缔约国领土上）**提供正当性**仅仅一步之遥。更何况，国际刑事法院早已不仅沦为某种“漩涡”——只要有愿意或政治需要，就可将任何国家的官员卷入其中——更已成为赤裸裸的政治斗争工具。且不论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和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发出的逮捕令，2025年3月11日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被捕并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的事件，就极具代表性。

2021年9月15日，预审分庭批准检察官对菲律宾2011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6日期间所谓“禁毒战争”中可能构成法院管辖范围的犯罪行为展开调查<sup>44</sup>。但此裁决及后续事件暴露了以下问题：首先，国际刑事法院对此根本缺乏属时管辖权（*ratione temporis*）。菲律宾已于2019年3月17日退出《罗马规约》，而调查却是在2021年9月15日才获批准。但法官们仍援引其对《罗马规约》第127条的解释实践<sup>45</sup>，以“心之所向，法必可至”的原则强行确立管辖权。其次，杜特尔特事件本质是政治清算。菲律宾作为已退出《罗马规约》的国家，此次移交行动并非承认法院管辖权，而是马科斯家族（现任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对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清算<sup>46</sup>。这表明国际刑事法院已沦为菲律宾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正如媒体所言，菲律宾调查事件“……给国际刑事法院独立非政治化运作的

<sup>42</sup> See: *ibid*, para. 38 and findings.

<sup>43</sup> See: ICC arrest warrant? No worries for Sudan's Bashir who visited 22 countries in 7 years, [March 8, 2016] / World Tribune: Window on the Real World. <https://www.worldtribune.com/icc-arrest-warrant-no-worries-for-sudans-bashir-who-visited-22-countries-in-7-years/> (accessed: 14.02.2025); Nuba Reports. Sudan's president has made 74 trips across the world in the seven years he's been wanted for war crimes: published March 4, 2016 / Quartz. <https://qz.com/africa/630571/sudans-president-has-made-74-trips-across-the-world-in-the-seven-years-hes-been-wanted-for-war-crimes> (accessed: 14.02.2025).

<sup>44</sup> Pre-Trial Chamber I: Situ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Decision on the Prosecutor's request for authorisation of an investigation pursuant to Article 15(3) of the Statute, No. ICC-01/21, 15 September 2021. [https://www.icc-cpi.int/sites/default/files/CourtRecords/CR2021\\_08044.PDF](https://www.icc-cpi.int/sites/default/files/CourtRecords/CR2021_08044.PDF)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8.03.2025).

<sup>45</sup> See: *ibid*, para. 111.

<sup>46</sup> 详见：菲拉托夫·С，《杜特尔特被捕事件对菲律宾、美国与中国的影响》，载《国际生活》杂志，2025年3月15日。<https://interaffairs.ru/news/show/50683> (访问日期: 18.03.2025); Smith T. The

能力蒙上阴影……”<sup>47</sup>，精准揭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本质蜕变：从司法工具堕落为肮脏政治的武器。

接下来还会发生何种非法行为尚不得而知。西方在世界上的地位正急速下降，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类，因此正在孤注一掷，不惜一切代价。这是一种必须考虑的危险。正因如此，我曾撰文指出对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元首执行非法裁决可能引发的后果。执行此类裁决本身可能被视为对被裁决国家的宣战理由（*casus belli*）。更不必说这种针对核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层的裁决的危险性。此外，作出此类裁决的人员可能并且应当受到被裁决国侦查与司法机关的调查和追究。

## 6.

需要记住的是，指控俄罗斯实施“侵略”的国家不仅包括美国<sup>48</sup>。此类声明既来自北约成员国<sup>49</sup>，也来自欧洲理事会大多数成员国，以及代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七国集团（G7）<sup>50</sup>。此外，非洲联盟也加入了指控俄罗斯联邦违反国际法、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行列<sup>51</sup>。

同时，我们不应自我安慰，例如认为联合国大会决议在形式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实践表明，在经济仲裁和针对俄罗斯联邦及俄罗斯个人的诉讼中，此类文件对法官或仲裁员的“内心确信”具有重要影响。

即使对于毫无根据的指控，也应做出详尽回应。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再次明确我们对所谓“侵略”指控的立场，西方顽固地将这一罪名强加于俄罗斯，而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则试图为这些指控赋予法律效力。

总结上述内容：

第一，2014年政变之后，基辅政权完全受西方国家控制，成为一个非独立的政治实体。被其蛊惑和统治的部分前乌克兰领土事实上（*de facto*）已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因此，俄罗斯对不承认政变并自2014年起遭受非法基辅政权攻击的顿巴斯地区的保护，不能从法律上被定性为“侵略”。

第二，根据《联合国宪章》，只有联合国安理会（包括其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有权确定“侵略”事实并针对侵略行为采取行动。任何其他机构——无论是联合国机构、其他机构或国际组织——均无此权限。其声明缺乏法律依据，在法律上无效。

---

ICC caught in clan rivalry in Philippines // Justiceinfo.net. January 27, 2025. <https://www.justiceinfo.net/en/140756-icc-caught-clan-rivalry-philippines.html> (访问日期:18.03.2025).

<sup>47</sup> Smith T. Op. cit.

<sup>48</sup> 美国总统拜登曾指责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称其针对乌克兰发动了“残酷且不必要的战争”(«President Biden ... accused Russia of violating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arter in its “brutal, needless war” against Ukraine»). See: Biden in UN speech accuses Russia of ‘extremely signific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arter // Fox News, September 21, 2022.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biden-un-speech-accuses-russia-extremely-significant-violation-international-charter> (accessed: 05.02.2025).

<sup>49</sup> The World Reacts to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 Lawfare,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lawfaremedia.org/article/world-reacts-russias-invasion-ukraine> (accessed: 05.02.2025).

<sup>50</sup> G7 Leaders’ Statement on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by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4 February, 2022 / European Council,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2/24/g7-leaders-statement-on-the-invasion-of-ukraine-by-armed-forces-of-the-russian-federation/> (accessed: 14.02.2025).

<sup>51</sup> 2022年2月24日，非洲联盟主席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马哈马特特别呼吁俄罗斯“无条件尊重国际法、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Statement from Chair of the African Union, H.E President Macky Sall and Chairperson of the AU Commission H.E Moussa Faki Mahamat, on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February 24, 2022 / African Union. <https://au.int/en/pressreleases/20220224/african-union-statement-situation-ukraine> (accessed: 05.02.2025)).

第三，国际刑事法院侵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主权（要求逮捕该国元首，从而阻碍其履行职务职能）的行为应被定性为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这首先是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联合国宪章》第24条）。

第四，俄罗斯并非1998年《罗马规约》的缔约国，而国际刑事法院正是基于该规约成立的。2016年，俄罗斯拒绝成为该国际条约的缔约方。因此，该规约对我国不构成任何义务。

第五，国际刑事法院的活动及其立场违反了国际习惯法和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所体现的“*pacta tertiis nec nocent nec prosunt*”（条约未经第三国同意，不得为其创设义务或权利）原则。

第六，根据《罗马规约》，签发逮捕令的意义在于使国际刑事法院能够进一步要求缔约国逮捕被签发逮捕令的个人，并将其移交法院处置（《罗马规约》第58条）。然而，当该个人作为非缔约国的高级官员享有豁免权，且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未获得该国合作时，签发此类逮捕令并请求缔约国逮捕该个人并将其移交法院处置，则违反了《罗马规约》第98条的规定。

第七，俄罗斯联邦总统作为主权国家的现任元首，享有免受外国刑事管辖的绝对豁免权：包括属事豁免（*ratione materiae*）<sup>52</sup>和属人豁免（*ratione personae*）<sup>53</sup>。在未明确表示放弃此类豁免权的情况下，国际司法机构对主权国家元首不具管辖权。

第八，根据联合国国际法院2002年2月14日就“2000年4月11日逮捕令案”作出的裁决，“国际法中已牢固确立，某些担任国家高级职务的人员，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与外交和领事人员一样，享有在其他国家免受民事和刑事管辖的豁免权”<sup>54</sup>。这一国际法规则同样适用于《罗马规约》缔约国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请求逮捕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国家元首的情形，这一事实在学术界也得到了承认<sup>55</sup>。不仅如此，国际刑事法院在某一案件中甚至承认，当国家代表其行事时，该规则不存在例外<sup>56</sup>。

《罗马规约》第27条规定，官员的豁免权不妨碍法院对其行使管辖权，这一规定与现行习惯国际法相冲突。该文件允许对现任主权国家元首进行刑事追诉，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特别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以及不干涉本质上属于国家内部管辖事务的原则。

---

<sup>52</sup> “属事豁免”是指国家官员因其在执行职务范围内所采取的行为而享有的免受外国刑事管辖的豁免权，这些行为属于“官方行为”的范畴。

<sup>53</sup> 属人豁免的主观适用范围：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享有免受外国刑事管辖的豁免权。属人豁免根据国际法规范自动承认，适用于在国际关系中代表国家的政府机关。该豁免适用于国家代表所实施的所有行为（无论是私人性质还是官方性质）。

<sup>54</sup> Arrest Warrant of 11 April 200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Belgium),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2, p. 3, para. 51.

<sup>55</sup> 参见：伊斯波利诺夫A. C.《试论全能之戒：国际刑事法院与国家元首豁免权》，载《俄罗斯法律杂志》2023年第2期，第40、52–53页；Akande D. International Law Immun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8. 2004. № 3. P. 410–411, 421.

<sup>56</sup> 在关于南非未执行国际刑事法院逮捕并移交奥马尔·巴希尔的请求的裁决中，预审分庭援引了国际法院2002年2月14日“2000年4月11日逮捕令案”判决第51段，并指出：“分庭无法识别习惯国际法中的任何规则，该规则会在因国际罪行而请求逮捕国家元首时排除其豁免权，即使该逮捕请求是以国际法院的名义提出的，特别是以本法院（国际刑事法院——作者按）的名义提出的。”(Pre-Trial Chamber II. Situation in Darfur, Sudan: in the Case of the Prosecutor v.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Decision under article 87(7) of the Rome Statute on the non-compliance by South Africa with the request by the Court for the arrest and surrender of Omar Al-Bashir, No. ICC-02/05-01/09, 6 July 2017, para. 68.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68ffc1/pdf> (accessed: 15.02.2025)).

第九,截至2025年2月,《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共有125个国家<sup>57</sup>(联合国会员国总数为193个)<sup>58</sup>。尽管有如此数量的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并不代表整个国际社会,也无法以其名义行事。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三个(俄罗斯、中国和美国)未参与其中,亚洲的工业发达及人口稠密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许多阿拉伯东方国家也未加入<sup>59</sup>。

第十,作出违法裁决的法官、检察官及其他官员可能并且应当根据俄罗斯刑法规定的罪行受到追诉。

## 7.

鉴于上述立场,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是:国际刑事司法在原则上将何去何从?俄罗斯的法学家们有必要在一切可能的平台上,以详实的论据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进行专业批评。向全球法律界、媒体以及各国公民阐明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冲突及其他紧迫问题上的国际法律立场。应积极且持续地解释争议问题,并表明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坚定承诺,特别是对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坚持。同时应争取让那些违反这些原则的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具体官员根据国际法和俄罗斯国内法承担责任。

在跨地区层面(例如在金砖国家框架内)探讨建立一个替代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法律机构的构想,显然是完全可行的。金砖国家的新司法机构可以确认该组织成员国的共同愿望,即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包括主权国家元首免受任何外国管辖的豁免权原则,以及禁止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包括非法向反对派领导人提供外国指示等方式。

至于国际刑事法院,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可以明确其在履行其根本任务——追究一切犯有种族灭绝、侵略、战争罪行但却逃避国内法惩罚的人员的责任方面完全失败。这里的“所有”包括西方国家和北约成员国的公民。当然,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基于当前的形式和角色,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是否会为此做出努力。因此,它应当成为历史。

然而,全世界人民对正义的渴望比任何制裁、压力、虚伪和谎言都更为强大。而全球社会共同制定的国际法,也比强权法则更有力量。既然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存在无法消除的缺陷,相关国家完全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国际刑事法院,以消除这些缺陷。其成立条约应基于所有公认的现代国际法规规范,包括关于高级官员绝对豁免权的规范。其管辖权可以涵盖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恐怖主义行为。这些行为往往在两国或多国领土上策划和实施。在新机构的框架下,国际合作将有机会制止这些行为。

我们愿意相信,这个新的法院能够实现《罗马规约》中明确宣示的,而国际刑事法院却未能达成的目标。

## 参考文献

- Akande, Dapo. 2004. International Law Immun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8 (3): 407–433.
- Alekseeva, Diana G., Yana O., Alimova, Inna S., Barzilova et. al. 2023. Law under sanctions. Mazhorrina M. V., Shakhnazarov B. A. (eds). Moscow, Prospekt Publ. (In Russian)
- Azarov, Nikolay. 2015. Ukraine at a Crossroads. Notes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Moscow, Veche Publ. (In Russian)

<sup>57</sup> 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Rome Statute /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https://asp.icc-cpi.int/states-parties> (accessed: 05.02.2025).

<sup>58</sup>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status as at: 14-02-2025 10:15:47 EDT /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1-1&chapter=1&clang=en](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1-1&chapter=1&clang=en) (accessed: 14.02.2025).

<sup>59</sup> 就人口总数而言,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占地球人口的大多数。

- Bachmann, Sascha-Dominick D., Sowatey-Adjei, Naa A. 2020. The African Union-ICC Controversy Before the ICJ: A Way Forward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9 (2): 247–301.
- Bosco, David. 2013. Why is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icking only on Africa?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9. Available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why-is-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icking-only-on-africa/2013/03/29/cb9bf5da-96f7-11e2-97cd-3d8c1afe4f0f\\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why-is-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icking-only-on-africa/2013/03/29/cb9bf5da-96f7-11e2-97cd-3d8c1afe4f0f_story.html) (accessed: 04.02.2025).
- 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Statute. Vol. 1. 2023. Klamberg M., Nilsson J., Angotti A. (eds). 2nd ed. Brussels, Torkel Opsahl Academic EPublisher. 1104 p.
- Filatov S. Duterte's arres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hilippines, the US and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15, 2025. Available at: <https://interaffairs.ru/news/show/50683> (accessed: 18.03.2025). (In Russian)
- Gevorgyan, Kirill. 2012. "Unilateral 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 Available at: <https://interaffairs.ru/jauthor/material/720> (accessed: 06.03.2025). (In Russian)
-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Fight against Crime.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1997. Zmeevskii A. V., Kolesov Yu. M. (introd.). Moscow. (In Russian)
- Ispolinov, Aleksey S. 2023. Trying on the Ring of Omnipotenc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Immunities of Heads of State. *Rossiiskii iuridicheskii zhurnal* 2: 37–58. (In Russian)
- Ispolinov, Aleksey S. 2024. Anatomy of a Crisis: Problems of Normative Legitimacy of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Zakon* 2: 124–132. (In Russian)
- Kjeldgaard-Pedersen, Astrid. 2020. Is the Quality of the ICC's Legal Reasoning an Obstacle to Its Ability to Deter International Crimes? *iCourts: iCourts Working Paper Series* 191. 29 p. 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Delivery.cfm/SSRN\\_ID3570447\\_code2133408.pdf?abstractid=3570447&mirid=1&type=2](https://papers.ssrn.com/sol3/Delivery.cfm/SSRN_ID3570447_code2133408.pdf?abstractid=3570447&mirid=1&type=2) (accessed: 05.02.2025).
- Klabbers, Jan. 2017.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70 p.
- Kritskiy, Kirill V. 2016. The terms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nd "unilateral restrictive measures". *Moskovskii zhurnal mezhdunarodnogo prava* 2: 204–213. (In Russian)
- Kritskiy, Kirill V. 2019. Sanctions and unilateral restrictive measures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PhD in Law thesis. Moscow. 186 p. (In Russian)
- Ning Yu. How US evades responsibility for war crimes in Afghanistan. *Global Times*. Available at: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9/1235240.shtml> (accessed: 14.02.2025).
- Pyatibratov, Ivan S. 2020. Sanctions and unilateral restrictive measures: the problem of delineation of terms and identity of phenomena. *Gumanitarnye nauki. Vestnik Finansovogo universiteta* 10 (6): 61–65. (In Russian)
- Ryzhova, Mariia V. 2006. Economic sanctions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PhD in Law thesis abstract. Kazan. 25 p. (In Russian)
- Schabas, William A. 2020. Chapter 1: The dynamics of the Rome Conference. *The Elgar Compan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de Guzman M., Oosterveld V. (ed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3–19.
- Shaw, Malcolm N. 2008.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XVI. 1542 p.
- Smith T. The ICC caught in clan rivalry in Philippines. *Justiceinfo.net*. January 27, 2025.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info.net/en/140756-icc-caught-clan-rivalry-philippines.html> (accessed: 18.03.2025).
-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2021. Heinze A., Dittrich V.E. (eds). Brussels, Torkel Opsahl Academic EPublisher. XXI, 783 p.
- Tladi, Dire. 2013. The ICC Decisions on Chad and Malawi: On Cooperation, Immunities, and Article 98.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11 (1): 199–221.
- van Alebeek, Rosanne. 2008. *The Immunity of States and Their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XXVIII, 449 p.